

当代语言学研究文库



翻译与文化身份

——美国华裔文学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Translation Studies on Chinese-American Literature

刘芳著

LINGUISTICS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译者序

翻译与文化身份

——美国华裔文学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Translation Studies on Chinese-American Literature

刘芳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汤亭亭和谭恩美小说作品为个案,借用后殖民理论来研究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翻译及该类作品的汉译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关系,指出译者通过翻译对源语和目的语社会中的特定文化身份进行了塑造,而译者本人的文化身份则对此塑造过程具有一定的影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与文化身份:美国华裔文学翻译研究/刘芳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当代语言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13-06508-7

I. 翻... II. 刘... III. 华人—文学—翻译—研究—美国 IV. ①I046 ②I7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2063 号

翻译与文化身份

——美国华裔文学翻译研究

刘 芳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1.25 字数:175千字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30

ISBN 978-7-313-06508-7/I 定价: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Foreword

本书由笔者在博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其研究对象是美国华裔文学(书中简称“美华文学”,其作家简称为“美华作家”,作品简称为“美华作品”)作品中的文化翻译及该类作品的汉译。本书的产生最初源自笔者对于翻译研究、文化研究及美国华裔文学的多重兴趣。

随着翻译研究学科建设的持续进展,其研究对象的范围亦呈不断扩大之势。但是,在我国翻译研究领域,研究对象还多局限于那些存在一个确定的原文文本并与该文本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对等”关系的翻译文本,这就限制了自己的视野,难以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对话,无疑是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与壮大的。当前世界人口流动空前频繁的状况促使包括美华文学在内的流散^①文学(diasporic literature)中的翻译现象引起了相关领域学者的注意,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前沿性和挑战性。由于西方学者对我国语言文化的了解程度远比不上我们对英语语言文化的了解,所以,在美华文学文化翻译的研究方面,我们无疑是具有优势的,完全应该凭借这一优势在该领域进行深入的探索,为国际译学的发展做出中国独特的贡献。如果说,与西方学者相比,我们具有语言文化上的优势,那么,与早已注意到美华文学中的文化翻译现象的文学研究学者相比,我们则具有学科训练上的优势。因此我们大可以在借鉴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对这一现象从我们翻译研究的角度进行理论

^① 首字母大写的“Diaspora”主要是和犹太人散布在全世界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而随着语义的演变,如今首字母小写的“diaspora”泛指生活在自己传统家园之外的任何个人或群体。该词的汉译有“族裔散居”、“离散”、“飞散”和“流散”等。

上系统、透彻的分析与探讨,以期能够透视其本质。

美华文学新人辈出,蓬勃发展,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也日成显学。由于该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对一些不具备语言特长的研究者来说,美华文学汉译本就成了他们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译本的质量与数量对于他们的研究工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胡勇(2003:27)曾经提到,美华作品汉译的严重不足已造成国内美华文学研究中的瓶颈效应。因此通过翻译大量引进美华文学已成必然之势。孙致礼(2003:4)指出:“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都要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现在,在实践先行的情况下,我们的理论研究只有加快步履,迎头赶上,才能对今后的翻译实践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使译文质量得到保证。就现有研究的稀少与单薄情况而言,该方面的探索显然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美华文学中的文化翻译与该种文学的汉译是“翻译道上的双程路,在这来回转折之中,有关文学翻译的种种问题,都很全面地显现出来”(金圣华,2002:26)。本书的写作目的,恰恰在于利用后殖民理论的视角,以文化身份与翻译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来揭示美华文学文化翻译及汉译中所隐藏的权力问题,探讨翻译作为殖民与解殖民(decolonization)^①的重要手段发挥效用的途径。

接下来阐述一下本书的研究方法。本书主要采取描述翻译研究的方法,将翻译作品放回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去研究、描述影响其生成的多项因素^②,进而对其中的种种翻译现象做出解释。不过,描述翻译研究强调研究者需要保持超然的、纯描述性的态度,不给出任何价值判断。而这一点目前已经遭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如西奥·赫尔曼斯(Theo Hermans)就提到,当今的人类科学都对“中立的描述”持怀疑态度,并列出如下几点原因:第一,所有的语言表达,包括描述在内,都带有一定的语气,是不可能做到中立的;第二,翻译研究者的观察和评论都是从某个特定机构的立场上做出的;第三,声称中立或是客观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示;第四,理解只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做出,起始于先入之见(Hermans, 2004: 36)。若

① 国内亦有译为“非殖民化”或“解殖民化”。该概念是指消除殖民的有害影响,尤其是消除前殖民地人民的集体自卑情结的渐进过程(Robinson, 2007: 115)。

② 即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所谓的“还原语境”(contextualization)(Toury, 2001: 29)。

泽·朗贝尔(José Lambert)对描述与价值评估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区别表示怀疑(Lambert, 1991: 31)。韦努蒂的批评就激烈多了。他认为描述翻译研究坚持不做价值判断的做法妨碍了翻译研究与引发最有影响的文化理论的那些趋势和论争相结合,将会使翻译研究的边缘地位永久化(Venuti, 1998: 29)。因此,我们采取的是埃多阿尔多·克里萨富利(Edoardo Crisafulli)提出的“翻译描述的折衷方法”(an eclectic methodology of translation description),即将经验描述与批判诠释相结合,在对翻译现象进行观察、描述与解释时并不排除研究者据有一定的立场,做出一定的价值评判(Crisafulli, 2007: 26-41)。我们认为这才是一种比较现实的翻译研究方法。

本书共分七章。第1章为绪论,介绍了本书展开研究所借用的后殖民理论以及文章的关键词之一“文化身份”,回顾并梳理了前人对翻译与文化身份之间关系的研究、美华作品中文化翻译现象的探索以及美华作品汉译问题的讨论。

本书以汤亭亭和谭恩美小说作品中的文化翻译及这些小说的汉译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鉴于此研究对象对我们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来说相对陌生,本书在第2章中专门对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对美华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自此涌现出的大量华裔作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汤亭亭和谭恩美,她们在带领美华文学冲击美国主流文学经典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们在作品里对中国文化的表述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翻译,既像西方的人种志那样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描述,在此过程中又涉及音译、直译等具体翻译方法的运用。此外,这种文化翻译融传统意义上的翻译与写作于一体,反映了来自弱势文化的移民在美国所经受的文化震荡。汤、谭二人小说在我国的译介时间跨度较大,且很多作品都有多个译本,这也充分体现出我国翻译界对她们作品的重视以及我们所选研究对象的代表性。

第3、4两章探索了美华文学中的文化翻译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关系。其中第3章分析了美华作家通过文化翻译对中国文化身份的塑造以及这些作家的文化身份对此塑造过程的影响。这些作家之所以担当起文化译者的职责,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主流文化里关于中国文化的种种刻板印象导致了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边缘化,这种状况的改变有赖于对中国刻板印象的破除及对其正面形象的树立;另一方面则是

因为华裔作家要赢得美国主流读者,在作品中翻译、阐释自己族裔的祖先文化以满足这类读者东方主义的阅读兴趣无疑是取得成功的捷径之一。美华作家这种矛盾的身份构成使得他们在再现中国文化时既有解构西方霸权文化价值观、宣扬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的一面,又有迎合刻板印象、凭借文化霸权不负责任地误现中国文化内容的一面。

第4章研究了美华作家的文化翻译对美国本土主流社会及华裔群体文化身份的塑造。美华作家在他们的文化翻译文本中引入了英语之外的其他多种语言,并大量使用破碎的英语,对标准英语造成污染,进而对语言的“纯洁性”所表征的美国霸权文化身份的单一纯粹性提出质疑与挑战。这也使主流读者意识到本质主义身份观的虚幻性,因而更有可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此外,这类文本的解读会促使有心的读者查阅相关的语言、文化资料,增加对异域文化的体验,并进而丰富自己的身份构成。美华作家还试图通过文化翻译来创造一种由英汉两种语言有机结合而成的、能够表述美国华裔情感的杂合语言,以表征自己的杂合身份。他们对中国神话的改写则促成了为本族群所特有的新神话的诞生,由此而来的族裔神话充实了美国华裔的精神世界,成为其身份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5、6两章就美华文学汉译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第5章检视了美华文学汉译者对美华作家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形象改造。美华作家的杂合身份决定了他们笔下的中国文化常有似是而非之嫌,而且有时他们由于某种需要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知识进行一定的改造。但汉译者对这些作家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导致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操纵文本,使美华作家看起来更像“自己人”,从而扭曲了其真实身份。

第6章论述了美华文学汉译与我们民族的文化身份建构之间的联系。近代以来与西方强势文化的碰撞造成了我们传统文化的流失与身份定位的模糊,现代译者在翻译还原美华文本内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时常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境。而部分译者对西方强势文化的一意认同又导致了我们的母语恶性西化,极大地影响了汉语的表达力,使之处于一种后殖民的失落状态。不过,美华作品的汉译也完全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形式,将中/外、古/今、中央/地方的各色文化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重建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重构我们的

民族身份。

第7章为本书的结论部分,总结了全书内容,并号召相关研究者就此课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20世纪70年代之后登上美国文坛的美华作家作品中的文化翻译现象正式纳入翻译研究领域的范畴并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理论探索,这本身便可算做一个创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以往的翻译研究中均对写作与翻译有着严格的区分。但随着翻译研究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翻译概念界定的不断扩充,翻译与写作之间的界线渐趋模糊,西方一些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部分传统意义上的写作用文本中隐含的翻译现象^①,并着手进行研究,且已有部分成果问世。有学者甚至提到了美国移民自传性作品里存在的翻译问题(Gentzler, 2005: 52-53),但大约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关系,就笔者所知,目前西方翻译研究领域尚无学者专门研究过美华作品中的文化翻译现象。就国内翻译研究领域的情况而言,虽早有人意识到这种藏身于写作里的特殊翻译,但具体研究展开较多的只限于几篇讨论林语堂早期英文作品的文章,而对当前已在美国主流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的美国华裔群星作品的关注却犹如空谷足音。我们认为,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其发展壮大应该兼顾深度与广度,既要对现有研究对象做进一步的深入发掘,又要不断地开疆辟土,时刻关注新的翻译现象在学科边缘处的浮现。我们可以预见,随着全球性的流散现象日益成为人类生活的常态,与之相伴而生的流散写作很可能会在将来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种“家园的跨民族译本”(童明,2005:150)并入我们学科研究的版图,甚至作为以后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主攻方向。美华作品作为流散写作之一种,有分量的新人新作正呈爆炸式增长,因此,我们翻译研究领域有必要及早对这一融翻译与写作为一体的特殊文类展开研究。而我们与美华作家之间在中国文化传承上的亲缘关系为我们在该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先天性的优势,我们应该凭借这一优势在国际译坛上发出我们中国学者自己独特的声音,为译学向纵深处发展做出我们特有的贡献。本书在翻译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

^① 这部分文本除了后殖民文学作品之外,还包括一些游记。有关后者中翻译现象的研究可参见 Cronin, 2003: 159-161。

于此可略窥一斑。

第二,将后殖民理论与具体的翻译文本分析结合起来,这在国内翻译学界尚不多见。西方学者率先将后殖民理论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并推出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余波所及,我国翻译研究者也纷纷采用后殖民的视角来进行翻译研究。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所出成果大多侧重于宏观的理论分析而缺少微观的实例论证。现有专题论著或是重在引介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如何绍斌,2002;李红满,2003;费小平,2003;王东风,2003等),或是着意阐发后殖民理论对于我国译学建设的启示意义(如祝朝伟,2005;胡德香,2005等),却鲜有具体的、原创性的译例分析。孙会军(2005:99-102;127-130)的专著中对于英译寒山诗和林语堂所译《浮生六记》的分析是少有的译例举隅。而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从所研究的翻译文本中摘取丰富的例子,并通过详尽的分析来对相关理论观点加以佐证。笔者希望本书中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一方面能够促进目前尚在萌芽状态的后殖民翻译理论的成长壮大,另一方面则能够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对今后美华作品的汉译有所启迪。

第三,将美华作品汉译研究正式提上国内翻译研究领域的日程。迄今为止,美华作品汉译研究仍属于国内翻译研究领域中的边缘课题,关注者不多,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我们看到,美华文学在美国文坛的发展如今已是如日中天,而国内的美华文学研究也在呈高歌猛进之势,因此,美华文学持续、大量的译介可谓是箭在弦上。美华文学汉译除了一般外国文学汉译可能会碰到的诸如外国文化专有项的处理之类的问题之外,还有其自身所特有的难点,如我们本书中多次提到的回译问题。由于中国文化资源的利用在美华文学作品中占有较大比例,正确处理回译问题就成了保证译文质量的一个关键。而原文中的中国文化内容经过先前的文化翻译过程后多有变形,不经仔细的分类研究而直接完全还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将美华文学汉译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课题,一方面结合理论与实践,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翻译原则与方法;另一方面则经由中国文化内容在这双重翻译过程中的形变来透视文化语境对翻译的种种影响。笔者希望本书在这方面做了一个较好的尝试。

第四,把现阶段翻译研究领域关于翻译与文化身份之间关系探讨的两条主要思路整合归一,展开研究。当前的相关研究或是限于翻译

对源语社会和/或目的语社会中特定文化身份的塑造,或是偏重译者的文化身份对其翻译的影响,似尚无人将这两点综合起来进行考查。我们认为,这两个方面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即译者的文化身份影响了其通过翻译参与源语社会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身份的建构。本书即是验证此假设的一处实验场所,相信我们的探索为翻译学中“翻译与文化身份”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可咨参考的第三条道路。

第五,注重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本书主要从如下领域获取丰富的资源:文化研究中的后殖民批评、从属于文学研究领域的美华文学研究和作为语言学分支之一的社会语言学。后殖民批评对于文化身份问题的探讨、文化间权力关系的透视、民族主义问题的关注以及“文化翻译”这一概念新意的阐发等从方方面面启发了本书的研究与写作;美华文学研究中关于美华作家及作品的介绍与分析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背景资料;而社会语言学界有关外来词的吸收、方言与普通话之关系等方面的讨论也使本书中的相关研究受益匪浅。杰里米·芒迪(Jeremy Munday)认为,由于翻译研究能够博采其他众多学科的知识以促进自身的发育成长,所以它具有发展成为一门“间学科”(interdiscipline)的潜能,而这种打破学科疆界的间学科的出现反映了现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信息爆炸的社会中知识交流的迅速性(Munday, 2001: 182-183)。因此,可以预想,跨学科合作及间学科的形成是今后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翻译研究的发展也有理由朝这个方向努力。本书算是朝此方向迈进的一小步,成功与否尚待评说。

第六,强调了翻译在当前全球后殖民语境中的双刃剑作用。通天塔轰然倒塌之后,翻译成为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进行沟通的主要途径。因此,翻译所起到的连接异质文化的桥梁作用历来为人们所称许。自从后殖民理论萌发以来,翻译作为昔日帝国殖民手段的不光彩历史才渐渐浮出地表。鉴于如今文化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我们有必要高度重视翻译在文化交流和对话中扮演的殖民化和非殖民化的双重角色。一方面,翻译可以充当强势文化渗透、控制弱势文化的入侵手段,或者成为弱势文化成员出于自尊心和自信心的缺乏而进行自我殖民的渠道;另一方面,翻译还能参与构建民族/族裔文化,以抵制与消解强势/主流文化的文化霸权,发挥它解殖民的重要功效。我们认为,对翻译这种双刃剑作用的普遍重视既有利于翻译及译者社会地位的提高,又可促使译者认识到翻译工作对于本民族文化建设的重意义

义及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从而以更为严肃的态度来生产出更高质量的译作。这样,翻译理论研究的社会功用即可得到彰显,象牙塔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对话有望结出推动人类文化和谐发展的硕果。

本书所涉及的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中许多概念尚处于争议之中,笔者在书内表述的许多观点或许也不无偏颇。希望学界前辈及同仁能不吝赐教,大家共同努力来推动该方向研究的发展。

刘 芳

目 录

Contents

- 第 1 章 绪论 / 1**
- 1.1 后殖民理论简述 / 2
- 1.2 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身份观及身份的政治 / 6
- 1.3 文献综述 / 10
- 第 2 章 汤亭亭、谭恩美小说作品文化翻译及汉译 / 17**
- 2.1 美华文学的双峰:汤亭亭与谭恩美 / 17
- 2.2 美华作品中的文化翻译 / 21
- 2.3 汤亭亭、谭恩美小说在我国大陆和
台湾地区的译介 / 24
- 第 3 章 美华文学文化翻译中中国文化的折射影像 / 28**
- 3.1 文化译者身份的成因:话语权的争夺 / 28
- 3.2 属下发声的努力 / 32
- 3.3 东方主义的阴影 / 54
- 第 4 章 美国本土文化身份的塑造 / 64**
- 4.1 语言的“污染”:权威身份的质疑与挑战 / 64
- 4.2 美国华裔杂合身份的塑造 / 70
- 第 5 章 民族主义立场上的形象改造 / 86**
- 5.1 文化、语言的“修正” / 88
- 5.2 “明晰化”的误区 / 94
- 5.3 “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 / 96

第 6 章 翻译与民族文化:流失与重建 / 101

6.1 传统的迷失与身份的模糊 / 102

6.2 文化重建与身份重构 / 121

第 7 章 结论 / 143

附录 / 145

参考文献 / 148

后记 / 166

第 1 章

绪 论

随着全球化前景的日益逼近和全球性交往的日趋频繁,翻译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其内涵也变得更为复杂^①,因此,翻译研究学科研究对象的范围亦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描述翻译研究兴起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与原文全面对等的文本才称得上是翻译,翻译研究的对象也大多局限于此。然而,描述翻译研究的创始人吉迪恩·图里指出,学者应对自己专业领域研究对象范围的限定持开放心态,并进一步宣称只要是在目的语文化中以翻译的面貌出现或是目的语读者认为是翻译的一切文本皆可称之为翻译(Toury, 2001: 32)。如此一来,翻译研究对象的范围便空前扩大了。不过,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认为图里的说法对具有翻译性质的现象仍有所遗漏,并以美国第一、二代移民的英语写作为例,指出这种“非翻译”(non-translations)中隐藏的翻译现象亦应纳入翻译研究者的视野(Gentzler, 2006: 33)。这就使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其中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美华文学。美华文学研究在美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已成显学,大陆虽起步较晚,亦在从边缘向中心高歌猛进。与此同时,其代表作家的主要作品在我国也陆续得到译介。然而这一“冒现的文学”

^① 目前,“翻译”这一概念的使用愈来愈趋向于隐喻层面。如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其论文集《想象中的故国》(*Imaginary Homelands*)里将族裔散居者的迁徙同翻译联系起来,认为“翻译”的拉丁文词源有“携带过去”(bearing across)之意,“既然撒播到世界各地,我们就是被翻译过的人”(“Having been borne across the world, we are translated men.”)(Rushdie, 1991: 17)。

(emergent literature)^①并没有得到我国翻译研究界的重视。不但注意到其中隐含的翻译现象的翻译研究者少之又少,该类作品汉译研究的成果也屈指可数。由于美华文学中往往包蕴有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翻译,所以其汉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回译(back-translation),具有与其他外国文学作品的汉译颇为不同的特质,值得深加探讨。鉴于我们目前在这两方面的研究尚有所欠缺,本书拟引入作为西方文化研究关键词之一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②的概念,从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对以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和谭恩美(Amy Tan)的小说作品为代表的美华文学中的文化翻译及该种作品的汉译进行研究。首先介绍一下何为“后殖民理论”。

1.1 后殖民理论简述

“后殖民理论”中的“后殖民”所指为何?对于该概念的厘定众说纷纭,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后殖民氛围: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一文中就其现有用法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概括:“a. 对于前殖民地国家社会状况的实际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它有非常具体的指涉,如在后殖民社会、后殖民知识分子这些词中; b. 对殖民主义之后全球状况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指涉更为抽象,不是那么具体,就像它所要替代的更早期经常使用的‘第三世界’那个词一样;c. 作为认识论和心理取向上对上述状况的一种话语描述,而这些认识论与心理取向也正是上述两种状况的结果。”(Dirlik, 1994: 329)由前两种用法可知,“后殖民”已成为一种新的世界格局,它既包括历史上有过切实的被殖民经历的国家,也包括那些似乎并不能以“殖民”一词去描述的非典型性区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盖娅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才慷慨陈

① 乌拉德·高基克(Wlad Godzich)认为,所谓“冒现的文学”指的是这样一些文学作品,它们不太符合“在我们学科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有关文学是什么的霸权主义的观点”。他给出的该类文学的例子包括美国境内的少数族裔写作、意大利或澳大利亚等国的女性文学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多数新作品等。见 Godzich, 1994: 291。

② 国内亦有译做“文化认同”、“文化属性”、“文化特性”、“文化个性”等等。

词道：“全世界都是后殖民的。”(Spivak, 1990: 84)

我们这个后殖民的世界仍然未能摆脱殖民主义的魅影。“后殖民”的“后”字只意味着昔日欧洲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定居点和军事征服实行直接统治的旧的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早已紧接着悄然登场，主要采取政治控制、经济剥削与文化渗透相结合的较为隐蔽的方式进行间接支配，以达到掌控、干涉与掠夺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目的。因此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才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接的控制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将要看到，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萨义德, 2003: 10)这些新殖民手段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通过文化期刊、旅行和研讨会来争取后殖民时代土著”(同上, 345)，即依靠文化知识优势与意识形态灌输来弱化和瓦解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意识。此外，在后殖民语境中除了这种文化帝国主义针对第三世界的外部殖民之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内部殖民情状。如德里克(2004: 88)在谈到美国亚裔社区时就指出：“社区的概念与视外国人后裔的社区为‘内部殖民主义’目标的观点密切相关，因此，这些外国人社区与世界范围内受到殖民的国家具有共性。”长期以来，西方主流文化就对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移民及其后裔在内的西方边缘文化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实施文化殖民，树立内部的他者形象，造成这些边缘他者对主流文化的依附，进而迫使他们接受主流文化的影响。这一点也受到后殖民理论的密切关注。

我们在上文里提到的德里克对“后殖民”现行用法的归纳中的第三点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后殖民理论。后殖民理论(有时可与“后殖民批评”、“后殖民研究”和“后殖民话语”这几个术语互换使用)是文化研究这一跨学科领域的一部分。关于后殖民理论兴起的时间，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是在19世纪后半叶即已萌发，至1947年印度独立后才开始出现。从理论渊源来看，后殖民理论受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影响很大；阿尔及利亚的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所著《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 1952)和《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1961)对殖民文化的深刻分析对后殖民理论的广泛兴起亦有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此外，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和“知识-权力”理论与雅克·德里

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思想也为后殖民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和理论依据。

1978年,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义德《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的出版表明后殖民理论开始走向自觉和成熟,该书被认为是后殖民理论真正确立的标志。在书中,萨义德着重论述了“东方学”(又译“东方主义”)作为“西方”的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是如何对“东方”进行人为的建构及表征的。在这种话语中创造的东方观念不但是对西方所缺省的东西——灵性、异国情调等——浪漫化了的观点,并且也是通过把东方描绘成衰弱的和败坏的形象来为西方对东方进行帝国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加以辩护。萨义德(2000:8)注意到“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东方”只是西方的一个发明,作为一个逊于西方的他者而存在。《东方学》对西方自殖民扩张以来的理论建构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奠定了后殖民理论的一般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此后,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中,萨义德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后殖民论域,集中阐释了文化控制与知识权力的关系,并将文化殖民主义批判的锋芒直指美国。他在本书中指出了西方文学叙事与帝国主义事业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后殖民理论的美学分析提供了重要模式。

与萨义德一道被誉为后殖民理论“圣三一”(the Holy Trinity)的是同为美国少数族裔学者的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印度裔女学者斯皮瓦克将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整合进自己的后殖民理论之中。她善于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去分析女性所遭受的话语权被剥夺的处境,运用解构主义的权力话语理论去透析后殖民语境中“东方”的地位,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殖民主义的形式及其构成进行重新解读,并力图从中恢复历史的真相。她将批判性、颠覆性和边缘性精神同自己本民族受殖民压迫的历史记忆联系起来,在历史话语的剖析、第三世界妇女的命运与帝国主义批判等几个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巴巴是生长在印度的波斯人后裔,他张扬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注重符号学与文化学层面的后殖民批评。巴特·穆尔-吉尔伯特(Bart Moore-Gilbert)在1997年编辑出版的《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一书中将巴巴的学术生涯分为两个阶段:1980~1988年间为第一阶段,其后为第二阶段。在前一阶段中,巴巴对帝国语境下的身份形成、精神影响和无意识作用